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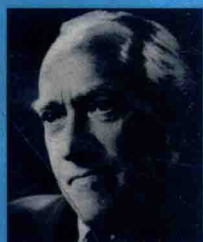


现代社会与人 名著译丛

Modern Society and Man

Kurt Goldstein

(美) 科特·戈德斯坦 / 著



Human Nature In the Light of Psychopathology

人的本性 以精神病理学视角进行的探索

王一力 / 译 王作虹 / 校

主编 / 陈维政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Human Nature

In the Light of Psychopathology

Kurt Goldstein

现代社会
与人
名著译丛

人的本性

——以精神病理学视角进行的探索

〔美〕科特·戈德斯坦 / 著

王一力 / 译 王作虹 / 校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的本性:以精神病理学视角进行的探索/(美)
戈德斯坦著;王一力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221-13948-1

I. ①人… II. ①戈… ②王… III. ①精神病—病理
学 IV. ①R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0156号

现代社会
与人
名著译丛

人的本性——以精神病理学视角进行的探索

(美)科特·戈德斯坦/著

王一力/译 王作虹/校

出版人	苏桦
组稿编辑	谢丹华 杨智婷
责任编辑	张秋菊 杨智婷
特约编辑	黄筑荣
装帧设计	刘津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 SOHO 办公区 A 座
邮编	550081
印刷	贵阳精彩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mm 1/32
印张	6.5
字数	135千字
版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1-13948-1
定价	28.00元

主 编 / 陈维政

副主编 / 刘小枫 陈维纲 谢丹华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作虹 冯 川 成 穷

许泽民 孙恺祥 陈维纲

陈维政 周邦宪 胡继华

查常平 黄筑荣

责任编辑 / 陈维政 黄筑荣

萧青印书馆 (Schocken Books) 纽约

本书根据纽约萧青印书馆 (Schocken Books) 1963 年第一版 (平装) 译出, 原书名 *Human Nature—In the Light of Psychopathology*, 版权由哈佛校长于 1940 年授予, 国会图书馆类别编号为 No. 63—20262

主编前言

现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注重人的主体性研究。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意在寻求人类和人类文化所依据的先在的根，由此而重识、重铸人与世界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人的研究一般是从两个方面入手的：一是对人的宏观研究，即着眼于整个人类社会及其各个侧面，如文化、政治、宗教、经济、历史等的研究；一是对人的微观研究，即立足于人的主体性，致力于探求人的深奥莫测的精神世界和千变万化的行为表现。

本译丛的编委和译者，多年来潜心于精神世界的探索，思考存在的终极目的，探究种种关于人的斯芬克斯之秘，如：善的本源、正义的标准、生存的意义、人的本质与命运，甚至人是谁。就此而言，我们深感有必要系统地考察和介绍世界另一端那些在进行同样探索的人的学术成果。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作为一面镜子，一扇窗户，正体现了这样一种见微知著的努力。

“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作为现当代西方著名学者对人的微观研究之集萃，主要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行为学、伦理学、宗教学等不同领域和不同视角对人的本质、人格、本能、意识、行为、情感、价值、需要、信仰等进行全面深刻地分析，力图揭示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精神状态、地位和关系，以及未来的演变。

除了上述明确的主旨外，本译丛还具有以下特点：

(1) 权威性，即所选著作全是有影响的经典名著；(2) 完整性，尽可能囊括了所有对人进行研究的重要学科与学派；所选著作多是西方现当代的研究成果，能反映西方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动向与主流；(3) 广泛性，内容广泛涉及人与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生死、爱恨到婚姻、家庭，从个体自由、价值选择到社会文化，从意识、无意识到精神冲突，等等；(4) 普及性，所选著作均出自名家权威之手，语言畅达，叙述生动，篇幅适中，能引起广泛的兴趣。事实上，这套译丛中绝大部分在西方曾一版再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而闻名于世。

“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自1987年在中国大陆首次出版以来，迄今已出版四十多种，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学界的好评，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其中有多种以中文繁体字版形式在中国台湾地区出版发行。

全体编委及译者多年来的艰辛换得读者和学界同仁的首肯，这也是无尽困惑中最大的欣慰和价值。

陈维政

2013年1月27日于四川大学

中译者序

科特·戈德斯坦 (Kurt Goldstein, 1878~1965) 是 20 世纪上半叶德国最著名的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家, 对神经症、精神病、脑损伤等的心理治疗有大量的研究, 也是为心理学研究奠定坚实的临床基础的西方知名学者之一。早在 1919 年, 戈德斯坦就被任命为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的常任教授, 并兼任神经病研究所所长和脑疾病医院的院长。他多年从事的心理学研究和心理治疗使他声誉日隆, 1927 年成为国际心理治疗学会的会员。1930 至 1933 年, 他一直在柏林大学讲授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 并成为这一领域的著名专家。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 戈德斯坦成为纳粹缉捕的第一批犹太人教授之一, 因而被迫逃亡。1934 年, 他写出了著名的代表作《机体论》, 建构了整体论心理学, 第一次阐述了自我实现的理论问题, 企图从生物学的视角对人的本性做出明确的解释。1938 年又被聘为威廉·詹姆斯哲学与心理学讲座主讲人, 讲授“从心理病理学看人类本性”问题, 由此为他后来写出本书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本于1940年由哈佛大学以英文出版的《人的本性——以精神病理学视角进行的探索》，是戈氏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之一。作者从自己丰富的实践和临床经验所得到的数据与观察出发，参照同时代其他相关领域的理论，提出了自己对人性独特的见解。他以精神病理学视角，根据对病例所做的生理与心理分析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包括正常人在内的人的生命机制最本质的属性。也就是说，从对精神病人的案例和反应进行的层层分析入手，作者并不停留在病理学的探讨上，他的终极关注是人类所反映的普遍的根本性问题，是人作为生命机体的生理和心理的最本质的属性问题。在今天看来，作者大半个世纪以前提出的论点和结论，仍然显示其对人的本性的切入本质的揭示，作者对人与人的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尤其是环境对人的决定性作用的解说，仍然拥有无可置疑的说服力。

这本书之所以曾经在西方的人文科学界引起热烈关注，是因为作者以全新的视角提出了几个对作为个体和群体的人的生理和心理现象的独具慧眼的解读，令人信服地阐释了不少一直困扰我们的与人的生存和环境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

首先，他指出，要对人本身及其所生存的环境进行研究，就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只看重发生问题的部分而忽视整体的其余部分，而是要运用一种新的正确的手段，即他所称的“整体论”的观点。他认为，我们不能再仅仅专注于个体或群体的人的反常表现中的那些单一的现象本身，因为这些现象不是生理、心理紊乱的本质所在。事实上，紊乱的本质因素是机体的正常功能被打乱而造成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冲击。我们必须了解人作为

整体的生命机制，他的人格特性，以及因紊乱而引发的整体机制的改变。在作者看来，整个机体的机制，也就是人这个特定的个体，才应该是医生——无论是治疗个人还是群体社会的疾病——所必须关注的中心。只有当个体被作为整个自然的一部分，尤其是他所属的人类社会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才能获得对个体状态的真知灼见。要理解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的反常表现，就必须考察这些表现的社会起源，必须考虑个体所生存于其中的环境状态。作者以其长期的对病理学现象的观察和实验，说明那种过度分门别类只专注局部的方法，或为了把握整体而只选取局部进行研究并以得到的结果作为整体状况的代表的做法，即他称为的“孤立法”，是何等错误或片面的做法。

作者在书中提出的第二个极具深度的观念，是他认定人的两个基本能力，即所谓抽象思维的能力与具体行动的能力这两个概念。他在列举大量病例后指出，抽象思维能力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精神病人的紊乱表现就是因为这一重大能力受损的结果。比如他指出，语言表达是人性的一個本质属性，它与人的最高能力——抽象行为能力密不可分。语言从不代表事物本身，而是代表思维对事物所形成的观念，这种形成是自主的活动，语言由此而产生。正是这一点才使得语言如此关系到一种文化的发展。“语言既表达了人的全部特性和人最深沉的东西，也表达了人与同伴精神上的契约”，所以他的结论是，“在所有的文化创造中，人在语言创造中才最充分地披露了自己。动物不可能创造语言，因为它们对世界不持有这种概念性的把握。最能证明这一点的，莫过于观察那些患失忆性失语症病人身上

发生的情况，丧失了对词语意义的理解的同时，人的整个人格也改变了”。

作者还对驱动人的生命机制的一个重大动力——人的“自我实现”的倾向——尽可能实现机体自己独有的那些能力的倾向，进行了全新的阐释。他认为这种自我实现的冲动是支配个体生命的唯一驱动力。他还说明，人的这种自我实现倾向不是一种在未来要争取的目标，机体在任何时刻都拥有这一根本倾向，即追求在与客观世界的接触中的每时每刻都实现自己全部的潜能。作者就此还有力地驳斥了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某些基本观点，断言正常人有一种内在的对新体验的渴求，想支配世界，在现实和精神两个层面扩展自己的行为领域。这两种因素交互作用产生的后果就是文化的发展和文化产品的出现，所以绝不能认为文化所代表的有序世界是焦虑的产品或回避焦虑的结果，像弗洛伊德（Freud）所认为的那样，因为弗氏认为文化是被压抑的冲动，甚至是性冲动的升华。本书作者认为，那是对人的本性具有的创造倾向的彻底的误读，而且那样还留下一个完全没有回答的问题：为什么文化领域会表现为某种特定的模式，并且为什么恰是这些模式适宜于赢得人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作者对此的回答是：“要让这个问题变得能够理解，只有将那些模式视为人的创造力的表现，视为人倾向于实现自己的本性的结果。”所以，作者说弗氏的谬误在于，作为弗氏理论基础的所有现象都是取自于非正常状态的人群，但弗氏把对这一人群的判断直接转移或运用到正常人身上，将精神病人的紊乱反应作为正常人的属性，将孩提时代的经历作为当前的体验。无可否认，戈氏作为多年研究精神病理学、拥有治疗精

神病人的丰富临床经验与大量实验数据的一线人员，他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很有分量的。

作者在书中还探讨了人最基本的两种情绪，即焦虑与恐惧。他所指的焦虑并非一般的烦恼，而是心理学层面的一种紊乱反应。他指出，恐惧是正常的心理反应，但焦虑不是。比如，在本书第四章里作者提到：“当焦虑侵袭某一群体或民族的时候，有可能迫使其中的个体在面临反常形势时能够做到放弃理性和自由的程度，这在外人看来是难以置信的。这尤其可见于政治领域。一方面对眼前局势不满并忧虑自身的生存，另一方面又被政治宣传描绘的光辉前景所蒙蔽和欺骗，一个民族就可能放弃自由、接受服从甚至甘受奴役。它这样做有可能是希望摆脱焦虑。这正是任何类型的暴君都乐于利用的状况，从而使他得以压抑自由人士并将社会公民变为愚氓。自由民众与芸芸众生的典型区别在于，自由民众能够享有做决断的自由权利，有勇气承受痛苦和忧伤……相反，所谓群众中的一员，他不是自由的，不去思考自己所做的事情，甚至因不用思考而快活；他不需要勇气，他在群体的其他人的意志那里找到摆脱焦虑的保护。他的行为举止就像是一个患有脑损伤的病人，他缺少人性中最高层次的能力，即抽象行为的能力，让自己迷失在由具体要求所决定的活动中。‘群众’是由被动的人所组成，由相同的需求和相同的焦虑所驱迫。正像我们的一个病人的行为能够被一个了解病人需求和恐惧的熟练的医生所改变和操纵一样，群众中的一员也能被支配和改变，甚至可以被引导去对抗不久前还是他最亲密朋友的人。一个社区越是坚定地以个体的自由为根基——

即越是真正的民主，这个社区的个体的人越能够抵御这种影响。所以，真正社区的个体和被操控的群众里的一员，两者之间的区别最终还是返回到有无抽象行为能力的区别上。”发自精神病理学的如此准确和锐利的揭示，是许多仅从社会学视角所做的批判难以相比的。

最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谈到个体与群体时提出，既然人与入关系中离不开每一个体实现自我的那种倾向，就可以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即个体是所有社会组织的基本要素。他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中，那个所谓‘我们’常常被视为基本要素了，个体的行为被认为是只能从这个‘我们’即群体的意义才能理解。的确，在某一具体场景中，个体常常很大程度上被他所生存于其中的那个群体所决定。但问题是：那个场景是不是正常的场景——或者说场景与人的本性相协调与否？”作者将“我们”即群体思考为次要的、低于个体而居第二位的東西，认为“我们”的概念绝不应该被简单地看成是个体之间的外在的联系。“它并不是由个体加起来的总和。真实的群体生活、社会生活并不是偶然生活在一起……真正的生活产生的条件是：群体成员之间存在真正的沟通。”此外，作者的某些论断可说是振聋发聩——特别是对习惯于丧失自我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如他十分肯定地宣称，绝不是先有集体后有个体，而是恰恰相反，“所谓‘我们’是由个体来决定的，个体才是群体适当与否的评判尺度，比起个体，群体是第二位的東西。凡是在群体强调自身优先的地方，不仅是个体的存在，而且还有群体的存在也受到威胁。如果一个国家认定一种独立于个体权利之外的固有价值，即会发生限

制人的本性的事件，其产生的严重后果既危害个体也危害国家”。戈氏还指出，假如群体规则实际上完全脱离了大多数成员的实际需求，那就是反常状态，“个体的生活那时可能会受到压制与局限，个体自我实现的空间不复存在。这样的状况导致灾难性紊乱反应与焦虑的出现……如此社会中的成员很像精神病人，他们缺少抽象思维能力，对外部刺激只会做出反常反应。像我们的病人一样，这些成员的自由受到局限，成为焦虑的受害者，如生计萎缩、生存得依赖他人或服从他人……只要群体与个体的这种失衡关系表现为某些制度的过大的权力高踞一切，这种紊乱会既影响个体也影响社会。社会于是处于扭曲的组织形式之中，居统治地位的少数人站在了人性的对立面。少数人强力推行非理性的因素以迫使人接受和理解靠理性本身已经不可理解的体制形式，因为这种体制已经违背了人的本性。如此的社会绝不是有创造力的，也很不安全。这一组织的存在必须靠发动规模庞大的活动来维持；由于它自身内部没有稳定性，于是其存在全靠利用人性中最恶的属性来维持，如通过强硬的机械手段、暴力、制造焦虑状态，使群众只有一种精神，只会一种行动。外在的有序只掩盖表面之下存在的无序，虽然这个表面有时很光鲜灿烂”。

毋庸置疑的是，对人类生存方式中出现的这种病态的社会形式或反常的群体组合形态，戈氏七十多年前从病理心理学角度进行的解剖和描述，较之于许多从批判现实主义的社会学角度所做的揭露，更具入木三分、切入本质的力量，更能引导读者去对作为个体和作为群体的人的生存状态进行深思并获得顿悟。

很可贵的一点在于，作为病理心理学家的本书作者，并不局限于研究精神病人思维和行为紊乱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环境的根源，不停留在生物学与医学的层面上，而是据此将自己的研究发展开来，涉及了对包括正常人在内的所有人的生命机制的剖析，尤其是以极具洞察力的论证探究了人作为个体和人所组成的群体的反常表现的根源；他在本书中所得出的结论、表达的观念，无不浸透地综合了生物学、心理学、病理学、神经学、社会学甚至人类学的多门学科的智慧与远见。此外，作者对人为了适应环境而表现的“首选行为”的内在原因，以及外在因素对人格状态的影响等，也都有深刻而独到的阐释。这种基于病理心理学又跨越多门学科的宽阔视野，是本书最主要的特点之一，也是它独特的魅力所在。

读者不难看出，本书作者七十多年前关于人的本性的那种深邃而富有透视力的论述，正是他对作为个体存在与群体存在的人所进行的敏锐观察而获得的独到见解。的确，这类学术作品中不可避免的专门用语常常令一般人望而生畏，但令人欣慰的是，本书作者并不以高高在上的学究姿态进行“布道”，而是尽量在论述自己的观点与介绍特有的概念时平易近人、娓娓道来，从而引人入胜，让读者不忍释卷。作为译者，只希望本书的中译文能尽量再现英文原作的真义与风采。该中文译本能够完成，我要感谢王作虹教授对译稿的精心校对，更要感谢四川大学的陈维政教授，是他细读了译稿并对不少关键字句给予了宝贵的指正。

王一力

2015年5月于西交利物浦大学

前言

《人的本性——以精神病理学视角进行的探索》一书，是1940年在哈佛校园举行的一个名为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系列讲座的内容。当萧肯印书馆提出重新出版这些讲座报告时，我自然想到应不应该把我新近的研究成果补充进去。思考之后，我认定没有必要也不恰当。给这本书增添更多的细节是累赘，只会把读者的注意力从那些中心概念上转移开来，而且会打乱原有的系列讲座的格式，因为那种格式十分适合于表述我的观点。

将所论述的材料作为各自独立的讲座来呈现，而每个讲座又只涉及某一特定的东西，那很可能造成误解，让读者以为我们探讨的是人性的各个单一的方面。而如果读者掌握了整体论的本质——我在我的《机体论》(*The Organism*)一书中有详细介绍，就不会这样认为了。从这一观点出发，要理解某一现象，只能通过思考它与别的所有现象的关系才可能做到。只有看到它在整个机制作用中的意义，才能够对它进行评价。本书的讲座报告是按照某种明确的顺序来安排的，使读者能逐渐领悟我对人的概念，正如我当初就是在探索人性的不同特征的过程里萌生出这一概念。

viii

尽管从这些讲座发布以来我并没有根本性地改变我对“人的本性”的看法，我还是认为应该提一提某些新的观察。这些新的观察涉及的是人的抽象思维(abstract)和具体行为(concrete)两种态度。这两种态度在我的关于人的概念中是很重要的东西。我认为这两种态度通过相互依靠而发挥作用。具体行为与抽象思维同时发生，常常还取决于抽象思维，甚至是由抽象思维所引起。因此，当我们看到似乎单凭具体行为就能生存的个体——比如人类的婴儿时期，我们就很吃惊了。婴儿来到世上时是一种很有限的生命机制，因为他的抽象能力还未发育。他逃脱了死亡的威胁是因为某种内在的机理立即发挥了作用；但这些内在的机理能够发生作用的条件是婴儿周围有人，尤其是他的母亲。这一保护在于为婴儿创建他能够适应的外在环境，其前提是了解婴儿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以及成长过程中生命机制的变化。这种了解和随之而来的照料婴儿的行为，产生于母亲对自己抽象能力的运用。因此，决定婴儿是否能够存活的因素被分配在两个人身上——婴儿和他的母亲。

ix

一个人的具体行为对另一个人的抽象能力的依赖，也发生在处于特定条件下的成人身上；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知道这种依赖具有的普遍意义。比如，一个成人面对的事情并不需要他运用抽象能力，甚至如果他运用了那种能力的话，反而有碍事情的完成。当操作工人必须持续地实行同一个动作、一种机械自动化似的行为时，就是这种情况。但是，操作工的具体行为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他使用的机器是通过另外的人的抽象能力才制造出来的。此处我不讨论为什么一个有抽象概括

能力的人愿意以机器人的方式工作，但这个重大的问题不仅牵涉到那个工人，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也牵涉到文明社会中的所有人。

由于文化的要求而带来的个体能力的非使用，有助于我们理解被广泛讨论的“原始人”的行为。这些原始人的行为显得如此具体，以至于我们认为能够断定他们的智力天生低下并称之为“前逻辑思维”。人类学研究现在已经表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们每日的生活基本同我们的一样，以这样一种机制运作，使他们大多数事情都不用抽象能力就能得到恰当的解决。已故的人类学家保罗·雷丁（Paul Radin）区分了两类不同的人：一种是“非思维者”，严格按照社会的规则来生活；另一种是“思维者”。思维者的数量可能不大，但他们在人群中起主导作用，界定概念并构建体系，然后毫无疑问地由非思想者接过去。不过，思想者与群体生活也有密切联系，所以他们也多少参与了群体的非思维活动。这就可能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他们的思维也是“原始”的。

由此，当我们区分什么是抽象能力的非使用，什么是没有抽象能力时，我们不再需要断言原始人智力低下。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原始”社会的成员在联合国里也发挥作用，他们也参与了世界上重大议题的决策。由于我此处不能详细探讨原始社会，我只希望读者去参考保罗·雷丁的著作，还有我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关于原始概念》，刊登在一本名叫《文化与历史——纪念保罗·雷丁的文集》中，该文集是哥伦比亚大学 1960 年出版的。